

曹磊 CAO Lei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 本刊编委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g University, and an editorial board of this journal

毛华松, 吴映华夏, 王雪纯, 谢守红. 国家文化公园综述: 内涵特征、实践进展与理论探索 [J]. 风景园林, 2023, 30 (2) : 57-64.

国家文化公园综述——内涵特征、实践进展与理论探索

毛华松 吴映华夏 王雪纯 谢守红

摘要: 【目的】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国首创的概念, 是以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与标识为目标的文化工程。开展系统性的综述研究, 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建设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国家文化公园政策文件、建设方案与建设保护规划的资料梳理和学术研究的文献追踪, 对其内涵特征、实践进展与理论探索做出总结。【结果】归纳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表现为: 1) 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从地方性离散到区域性整合的文化资源集群保护的内涵本质, 表现出国家性、地方化、公园型的概念特征; 2)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逻辑为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 分载体、分省域、分阶段开展, 形成了基于国家性与地方化的综合性资源识别方法、基于资源属性与保护发展的总体空间布局与主体功能区设置、基于落地建设与管理运营的关键领域基础工程与体制机制保障; 3) 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探索主要围绕多元载体拓展、特色资源补充以及均衡发展、边界划定、跨域协同、法规保障等方面展开。【结论】在国家文化公园内涵特征、实践进展、理论探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从规范建设、边界整合、创新传承 3 个方面提出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展望。

关键词: 国家文化公园; 线性文化遗产; 内涵本质; 概念特征; 空间规划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宋代城市风景的营建机制及空间模式研究”(编号 51878087)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30(2023)02-0057-08

DOI: 10.12409/j.fjyl.202207260439

收稿日期: 2022-07-26

修回日期: 2022-12-13



国家文化公园属于中国首创、侧重文物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旨在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与标识打造的新型公园类型, 对于中国遗产话语的“范式性”国际化交往和本土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1]。国家文化公园的相关政策经历了概念思考、建设规划和建设提质 3 个阶段。1) 概念思考阶段。2016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 在“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章节的“文化重大工程”专栏中, 首次将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的组成部分提出, 吹响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号角; 2017 年 1 月,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3] 明确将“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 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纳入“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任务中; 2017 年 5 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4] 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章节的“中华文化遗产工程”专栏中提出“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

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 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 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这一阶段初步明确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资源载体和目标方向。2) 建设规划阶段。2019 年 12 月,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5] 确立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概念, 即“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 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 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 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 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同时明确了长城、大运河、长征 3 个首批国家文化公园的线性空间载体; 2020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6] 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章节提出, 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方面上,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 强化重要

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 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 提出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构想; 2022 年 1 月,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7]。这一阶段在明确 5 个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上, 推进各省市分段规划、示范建设, 标志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确立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8] 工作格局的形成。3) 建设提质阶段。2022 年 8 月,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9] 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章节中, 强调“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2022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章节的“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部分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9]。这一阶段标志着国家文化公园已结束了从无到

有的初始阶段,进入关注如何“推进”“建好”的质量提升关键阶段。

现有研究与上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3个发展阶段对应,内容涉及概念分析、实践建议、价值提升3个方面。在概念分析上,已有研究将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外国家公园、欧洲文化线路、美国遗产廊道、中国线性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进行对比,梳理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缘起、特质、目的、意义等内容^[1,10-13]。在实践建议和价值提升上,从建设载体和资源识别、空间规划优化、保护工程等方面,关注了长城、长征、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建设情况^[14-18];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理念、建设目标、遴选方式等方面,总结了可供借鉴的国外历史文化类与文化型国家公园的经验^[19-21]。以上研究也揭示了当前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需要突破的问题:面对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国首创文化工程的属性,如何实现载体复杂性与文化标识打造的协调、处理好经验借鉴与实际创新的关系?针对这些思考,本研究从内涵特征、实践进展与理论探索3个层面,提出国家文化公园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方面的展望,在多元文化资源整合、复杂城乡发展需求和国家文化标识建设等方面为国家文化公园提供经验思考。

1 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特征

把握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本质和概念特征有助于理解其规划建设的总体框架,推进其高质量建设。虽然国家文化公园是“在吸收国外国家公园和区域性遗产保护等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家公园体系和制度上衍生的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方式”^[13],是“国际遗产保护空间范围从单体建筑向集群式遗产、大遗址、文化街区、历史城镇、文化线路逐步扩大”趋势的响应^[1],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文化公园反映了“文物和单体遗产已不足以承担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文化、精神层面国际地位”^[1],显现了“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大结构叙事’”^[22]。可见,国家文化公园由中国首次创新发展,具有区域性文化资源集群保护的内涵本质和国家性文化保护、地方化

文化发展、公园型文化共享的概念特征。

1.1 内涵本质:从地方性离散到区域性整合的文化资源集群保护

国家文化公园的集群保护主要表现在文化资源和保护方式2个方面。在文化资源的集群上,国家文化公园依托具有中华地理空间标识的巨型线性载体,结合载体文化的主题性、连续性特征,突破了单体文化资源类型、时空边界、地方与部门管理边界,对沿线文化与自然资源进行系统性保护,以集群的形式建构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中国符号、标识。其一,与文旅部门的文保单位、大遗址保护区、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生态保护区和城乡建规部门的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不同,国家文化公园打破了文化与自然割裂的局面,以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综合性保护代替单体或单地域的离散性文化资源保护^{[14]16-18};其二,国家文化公园依托长江、黄河、长征、大运河、长城等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大尺度、大范围、大跨度“地理媒介”,联动了不同子文化空间区段,发挥出文化价值的集合放大效应,凸显文化共同体价值^[22-23],反映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遗产体系。

在保护方式的集群上,国家文化公园通过4类主体功能区的划定和五大关键领域基础工程的设立等方式实现了资源集群化保护,进而实现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等复合功能和文旅发展、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等多元目标。国家文化公园集群化的保护方式实现了“遗产要素导向型”分头保护到“管理目标导向型”统一保护的转变^[1],以及意象式松散集合到功能性有机整体的转向^[16],建构了文化遗产作为战略性“社会-技术”集群^[24]的创新性方法。这样的“社会-技术”集群方法,从资源保护、文化阐述、设施配套、环境修复等方面,关注多元主体、多重功能、多重分区的协同,将遗产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和文化生态来保护^[16],平衡了文化保护与公众权益之间的关系。

1.2 概念特征:国家性、地方化、公园型

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体现在国家意志的战略目标、中国符号的形象定位和中央统筹的组织保障上。1)在国家意志的战略目标

上,“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成为相关政策文件的共性目标,体现了“文化自信”国家战略下提升中国文化遗产国际话语权、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诉求。2)在中国符号的形象定位上,首先,国家文化公园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这样跨区域、代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中华精神形成发展的共性地理媒介为载体,与“西欧美族认同型国家和中东宗教认同型国家”有所区分,从国土层面建构了中华文化总体性把握的形象体系,架起了强化国民文化身份认同感的通道^[25];其次,国家文化公园具有世界级、国家级文化资源的支撑性,如《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就明确指出作为参观游览和文化体验的主体区域,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展示园应该由“国家级文物和文化资源及周边区域组成”^[5],反映出国家文化公园所具有的国家性文化脉络。3)在中央统筹的组织保障上,国家文化公园从公园名单、规划方案、建设分期等方面,建构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5]的推进机制,协调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确保国家意志、中国符号的全面呈现。

国家文化公园的地方化体现在差异互补的地方特色、价值外溢的地方发展和落地实践的地方支撑3个层面。1)在差异互补的地方特色层面上,国家文化公园跨越文化单元、要素类型、时空边界的集群保护,促使国家形象定位与特定地域、不同文化特点的“和而不同”得到彰显。在已启动的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中,带、段、线、区的文化聚类引导成为既能凸显整体标识、代表国家形象,又根植于地方特色的普遍规划途径,实现了国家性宏大叙事与地方性特色故事之间的关联^[25]。2)在价值外溢的地方发展层面上,国家文化公园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的差异化管控,为“拓展投融资渠道,完善多元投入机制,确保公园建设、管理和运营实现可持续发展”^[25]提供了空间保障;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大关键领域基础工程的系统推进,指

引、统筹了文旅发展、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保护的可持续发展。3) 在落地实践的地方支撑层面上，国家文化公园明确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承上启下开展建设”^[6]。因此，立足省（市）区段资源禀赋、人居环境、社会经济等基础条件，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建设等地方现状，建构差异化发展路径和策略，是国家文化公园落地建设的地方化保障。

国家文化公园的公园型表现在服务主体的大众性、空间结构的开放性2个层面上。1) 在服务主体的大众性上，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的特定开放空间公共文化载体，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等方面服务公众，通过公益性突出强化了国家文化公园与营利性景区、公园的区别^[15]。2) 在空间结构的开放性上，国家文化公园的4个主体功能区都明确以文旅融合为导向，积极融入城乡公共空间体系，反映出通过传统文化融入时代血脉的方式，达到激活“价值基因”、舒展“生活场景”的目的，来平衡文化资源保护与公众权益实现之间的关系^[16]。

2 国家文化公园的实践进展

综合已发布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和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和省域的建设保护规划文件可以看出，国家文化公园已围绕总体空间布局、建设目标、主体功能区、关键领域基础工程、体制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开展了全面建设。

2.1 基于国家性与地方化的综合性资源识别方法

资源识别的意义在于对文化标识资源的梳理，厘清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建设要素，推动地方文旅发展。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的资源识别实践基本依照已纳入文物或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文保单位、名城名镇名村、历史建筑、风景名胜区分等名录执行，且具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同时，为实现地方

建设的差异化，结合地方文化资源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在资源识别体系中补充了相关自然资源以及未纳入保护体系的文化资源。国家文化公园的资源识别的具体实践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 突出国家代表性的文化资源的核心和主体。立足“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6]的要求，资源识别以与各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载体紧密关联的国家级遗产为核心实现建设支撑，如主题展示区的核心展示园依托国家级资源划分^[9]。2) 注重地方性文化资源的统筹和融入。首先，资源识别将省、市（县）两级的文化资源纳入，并且其数量占比远超与载体紧密相关的国家级文化资源，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识别出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37 257处，占全级别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99.31%^[26]，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识别出省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6 683处，占全级别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94.78%^[27]；其次，资源识别也包含未被纳入保护体系但价值高、能彰显地区特色风貌的资源，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的题名文化、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音乐文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诗词文化^[28-29]均被纳入各自实践的资源识别体系。3) 兼顾国土生态修复、历史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识别与纳入。一类为自然保护地的识别，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识别出国家级和省级的自然保护区、地质自然公园等137处各类自然保护地^[26]；另一类为文化资源周边有重要影响的自然资源，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识别出历史环境中的骨架性山水，从而实现由湿地群落、名山群落、公园群落构筑而成的“山水群落”格局^[28]。

2.2 基于资源属性和保护发展的总体布局与主体功能区设置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总体布局以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为基础，依托行政边界来进行边界框定、分段分区管控。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边界大多以县域划分，但在城镇化率高、文化资源丰富的区域则以乡镇边界来划分，如长城国家公园（北京段）综合考虑了长城保护区划界线、乡镇行政边界，以及浅山区、

生态保护区等相关规划的边界情况进行协调衔接^[30]。在分段上，呈现出国家层面基于宏观管控的跨行政区域文化主题分段、地方层面基于实践落地的行政单位分段2种模式。国家层面整体规划有多于跨越省级单位数量的分段方式，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跨越15个省（市）划分为18段，形成“一带十八段二十六区多点”的总体规划格局^[31]；也有少于省级单位数量的分段方式，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跨越15个省（市）划分出14个篇章，构建“一轴四线十四篇章”的整体空间框架和叙事体系^[32]。在分区上，国家层面重点控制引导重点展示园、带、点等展示区设置，地方层面则结合文化资源和主题性再加以拓展，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核心展示园由会宁红军会师、南梁革命根据地等5个国家级重点展示园和两当红色革命、泾川四坡村等4个省级核心展示园组成^[33]。

国家文化公园的主体功能区按照资源保护、阐释、利用的递进关系，分为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4类。其中，管控保护区和主题展示区以文化资源保护和价值传递为导向，前者侧重本体保护，后者注重对主体性资源的阐述展示与宣扬传承。管控保护区根据载体类型、资源特征、地域分布，在各个国家文化公园中呈现明显的差异性，主要分为2类：一类为点状形态的管控保护区，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依托展览博物馆、重大军事转折事件发生地等以点状资源进行划分；另一类是带状与点状形态共存的管控保护区，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线性河道及周边重要文化资源，形成以带串点的管控保护空间组织。主题展示区由于资源空间集聚的规模、形态的差异，具有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3类形态：核心展示园在区位优势、面状集聚的区域展开，集中展示带在线状集聚的区域构建，特色展示点在区位独立、布局游离、资源分散的区域建立。例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的建设方案统筹考虑了资源价值、密集程度、文明标识体系、展示基础条件，构建了39处核心展示园、4条集中展示带、41处特色展示点，并特别强调要加强核心展示园与集中展示带

相关资源的整合联动，同时也要求突出各核心展示园错位联动发展^[26]。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在管控保护区和主题展示区的基础上，通常依托沿线富集的文化资源空间及其周边资源联合建设。文旅融合区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外溢辐射效应形成价值延展空间，重在开发联动与地区发展。传统利用区则依托文旅融合区范围外的村、镇、街区的资源，重在传统元素的呈现与活态传承。例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推进“长城+历史文化文旅融合区、生态文旅融合区、现代文旅融合区”3类22个文旅融合区建设，同时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建设长城关堡类、长城戍边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传统利用区^[34]。

2.3 基于落地建设与管理运营的关键领域基础工程与体制机制

关键领域基础工程是国家文化公园中“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作用，围绕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同目标”系统推进的工程^[5]，通过打造重点标志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展示、融合、联动、利用，分为保护传承、研究挖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大必备工程。在实践中，各国家文化公园可根据面临的不同实际问题调整公园整体和地方局部的侧重点。在公园整体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强调长征精神的红色教育意义，在五大必备工程的基础上增加教育培训工程形成六大工程^[32]。在地方局部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在五大必备工程的基础上，为提升防涝排涝、通航的能力，同时聚焦水资源优化配置、岸线保护和服务提升，新增水利航运工程^[35]。五大必备工程建设的共性和差异明显。共性体现在保护传承方面皆强调文化资源整体性、全面性保护；研究挖掘方面均重视基础研究、考古挖掘；数字再现方面，均运用5G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差异性则体现在环境配套方面，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更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水环境优化，而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更关注沿线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文旅融合方面，在各地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建设中，线路、产品根据各自识别的资源进

行整合，各有侧重^[26]。

在体制机制保障中，已形成由中央统筹整合规划，各地落地执行的“总-分-总”形式，有序推进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运营、管理。如最先启动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各省、市、县（区）按照建设方案要求，已全部完成省级分段规划及大部分市、县（区）分段规划。同时，注重国家文化公园的事权确立，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率先建立其行政区域内的法定条例，明确省市（州）县三级在资源认定、功能区划分、关键领域基础工程建设以及社会主体参与机制的权责^[36]；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明确各部门事权，省委宣传部负责统筹领导，省发展委制定建设保护规划和重大项目库，省文物局负责管控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并配合主题展示区范围划定，文化和旅游厅负责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范围划定，财政厅负责统筹财政资金^[26]。

3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探索

3.1 载体类型与资源识别

国家文化公园的载体选择应在满足国民高度认同、代表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独一无二的基础上^[11]，覆盖点、线、面状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具有一定地理空间的带状结构巨系统^[37]。在国家文化公园载体的补充方面：1）针对线状载体，李飞等^[1]认为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类型或可作为未来载体的备选；2）针对点状载体，孙华^[12]提出古人类洞穴遗址、木构建筑、传统村落等也适于作为载体；3）针对面状载体，彭兆荣^[10]、孙华^[12]、李飞^{[14]25-27}、雷蕾等^[38]、刘进等^[39]认为可以将如汉文化大遗址、农业文化遗产、革命摇篮和根据地延安地区、国家疆域海洋与岛屿、特定事件战役与奥运等大遗址资源列入载体范围。此外，李飞^{[14]25-27}还指出酒文化、茶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应纳入载体范围。

除了对载体类型的讨论，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文化公园资源识别方式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柏贵喜^[37]提出资源识别应形成文化遗产本体要素和环境组成的内外多层次系统。

对于建设范围内与载体关联且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王健等^[40]、程宏亮^[41]、张明宏^[42]、李云鹏^[43]、康海玲^[44]、陈喜波等^[15]认为，诗词、艺术、戏曲等非物质文化资源以及历史性生态景观也是需要重点识别的对象。

3.2 建设思路与空间规划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求主体功能区和关键领域基础工程形成层次清晰、重点突出的保护体系。但在国家文化公园实际规划建设过程中，由于跨地域、多单元、时空边界模糊、要素类型多元等客观因素，存在发展不均衡、边界不明确、产品同质化等问题。

首先，对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学者们建议从文旅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禀赋2个维度，对不同的资源赋存区域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和策略^[45]。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陈喜波等^[15]建议北京段应以维护生态廊道为建设重点，有效释放叠加于廊道上的生态、文化、经济和社会效应；黄杰等^[46]、李玮^[47]建议对于遗产点占总数40%的江苏段，应聚焦运河古镇保护复兴和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打造研学旅游品牌，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同时，文旅融合应结合地方适应性规划，如张朝枝^{[14]18-19}提出长城大部分地理位置并不适宜开展规模性旅游活动，应平衡国家文化标识与当地旅游产品的形象建设；王健^{[14]23-25}认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避免一味强调“文化旅游景观建设”。

其次，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边界不确定、遗产保护地区交叉重叠、与其他公园类型难协调的问题，汤羽扬^{[14]16-18}建议将大型文化遗产保护管控双线纳入国土空间管控，邹统钜等^[16]建议制定重大文化遗产整合归并办法，优化边界范围和功能分区；刘敏等^[18]强调应协调古河道、古镇、古村等文化遗产本体保护与产业开发空间的功能范围。

再次，对于空间规划如何改善产品同质化问题，聚焦到五大必备工程的地方性差异化发展，学者们分别提出不同的建设思路。1）在保护传承方面，刑亚萍^[48]提出可依托文化、自然复合资源，辐射周边地区构建国家文化公园总体空间结构，白栋影等^[49]建议通

过融入与建构文化记忆,进行地方性文化记忆场所的保护、建设与传承利用。2)在研究发掘方面,李严等^{[14]19-21}建议需要着重梳理各资源点的时序关系、区位关系、事件关系以及游步道与各遗址点、资源点之间的链路关系。3)在环境配套方面,张曼等^[50]建议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生态资源为本底,结合长城健康绿道等项目,建设面向公众开放的“自然疗愈园”探访路线,配套开发健康特色产业;杜凡丁等^[51]提出建立由红军路、串联步道和连接线组成的长征历史步道体系,分段分类进行治理保护,形成“万里红路、千村串联”格局。4)在文旅融合方面,梅长青等^[52]建议立足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不同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及文化形态构建差异化的流域特色文化产品市场体系;梅耀林等^[53]、刘素杰等^[54]、刘敏等^[55]提出谋划跨省(区、市)文旅线路,差异化表达文化服务形态,丰富非遗小镇、村寨等示范性载体和非遗价值转化增值模式。5)在数字融合方面,李严^{[14]19-21}提出通过历史图档、遗存图像与三维数据,建构数字再现的“长城全线数字孪生计划”,并注重实体与虚拟同步建设,实现国家文化公园的全线周期性数据更新和动态监控。

3.3 管理体制与保障措施

国家文化公园在管理体制创新、资金机制探索和法律保障机制建立^[55]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管理机构不稳定、政出多门,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效率不高,财政资金保障不足、推动受阻,跨域协调机制不完善、成果同质,法律法规不健全、指引缺乏等问题突出。

目前相关讨论集中于全域与省域层面,全域层面,吴丽云等^[55]指出应构建“国家一省一市一县”的管理机构、多种类别的资源形成统一的管理机制、省市财政专项资金与“债券+基金”社会参与资金机制、联席会议与“专门委员会”加智库团队结合的跨域协调机制,出台《国家文化公园法》系统保障法律法规等;王利伟^[56]认为要坚持统得到位、分得清晰、统分结合的管理体制取向,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跨区域、跨部门管理制度体系;祁述裕^[17]认为建设资金和责任主体不

确定的问题可以通过统筹资金来源和建立管理机制来解决,如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建立文化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和发行地方债券等方式;安倬霖等^[57]认为政出多门的问题可以通过文化景观的尺度转换促使各部门联合出台管理文件来解决。省域层面,白翠玲等^[58]认为可以通过统一建立管理机制、特许经营与多方参与机制、政府为主和社会参与资金机制、制定法律法规保障等方法,解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土地难以统筹管理、居民建设意愿不强、资金短缺、权责混乱等方面的问题;刘晓峰等^[59]认为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省域管理层面,可以通过组建实体管理机构、明确多元主体责任、完善管理运行体制等方法克服国有文化资源所有者权益不到位、政出多门和管理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

4 结语

在国家文化公园不断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业已形成初步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但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化、空间边界整合、保护传承创新3个方面,仍有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发展空间。

1)国家文化公园的规范体系建设。当前各地建设的资源识别、空间划定、管控要求差异性大,在文化资源集群保护的全面性、系统性执行上程度不一。应参考《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公园法》等国家公园规范体系,尽快开展涵盖资源识别、空间划定、管控要求的国家文化公园规范体系建设,强化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保障。

2)国家文化公园及主体功能区的空间边界整合。目前全国各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实践中的空间范围过大或主体功能区边界模糊的情况,造成了国家性标识特征不突出、资源保护难度大的问题。综合文化、自然资源已有边界、管控要求,面向4个主体功能区的保护发展目标,开展资源识别、管控要求、整合方式的边界划定研究,是对接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确保文化资源活态保护的重要拓展方向。

3)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传承创新。国家

文化公园作为公益化项目,尚面临着商业化的窘境。因此,从文旅融合的视角,如何结合各地各点的社会经济特征,强化文化阐释、参与体验、教育培训等途径和方法,是凸显国家文化公园在地化、公园型的理论与实践方向。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J].旅游学刊,2021,36(1):14-26.
LI F, ZOU T Q. National Culture Park: Logical,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 14-26.
- [2]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6-03-18(1).
Xinhua News Agency. Outline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 People's Daily, 2016-03-18(1).
- [3]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64(6):18-23.
Xinhua News Agency. The General Office of CCCPC and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sued the *Opinions on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to Inherit and Develop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J]. Gazett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64(6): 18-23.
- [4]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64(14):5-21.
Xinhua News Agenc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lan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J]. Gazett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64(14): 5-21.
- [5] 新华社.中办国办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N].人民日报,2019-12-06(1).
Xinhua News Agency. The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Construction Plan for the Great Wall,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N]. People's Daily, 2019-12-06(1).
- [6]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0-11-04(1).
Xinhua News Agency. Proposa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Formula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Vision of the Year 2035 (Adopted at the 5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n October 29, 2020)[N]. People's Daily, 2020-11-04(1).
- [7] 新华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N].人民日报,2022-01-04(4).
Xinhua News Agency.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onstruction Officially Started[N]. People's Daily, 2022-01-04(4).
- [8]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

MAO H S, WU Y H X, WANG X C, XIE S H. Review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Progress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3, 30(2): 57-64. DOI: 10.12409/j.fjyl.202207260439.

Review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Progress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MAO Huasong, WU Yinghuaxia, WANG Xuechun, XIE Shouhong

Abstract:

[Purpos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initiated by China. As a new type of park,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im to create important signs and logos of Chinese culture so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aradigmatic”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heritage discourse.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re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plann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Methods] Based on data sorting of policy documents, construction plans, construction protection plans, and literature tracking of academic research related to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progress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n China.

[Results] 1)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reflect the connotative essence of the clustere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local dispersion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present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 of nation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park orientation. Clustered protec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clustered protectio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s reflected in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national will, the image positioning of Chinese symbol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of central planning; “loca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the local development with value spillover, and the local support for implementation practice; “park orient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popularity of service subject and the openness of spatial structure. 2)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s supposed to be conducted by carrier, province and section following the logic of extending from macro control to micro refinement, and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local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 general spatial layout and specific layout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based on resource attribute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 guarantee for basic projects and releva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in key areas based 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sources highlights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and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gives consideration to nation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general layout is based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lies on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for boundary framing and segmented control; the main function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control protection area, theme exhibition area,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rea, and traditional utilization area; the basic projects in key areas are divided into five essential project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research and excavation, environmental support,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reproduction. In terms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guarantee, a construction mode of “general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joint implementation-unified acceptance” has been formed, which entails top-level desig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s. 3)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mainly focuses on the expansion of multiple carriers, the supplement of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the balancing of development, the delimitation of boundary, the improvement of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the perfe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cholars suggest that carriers should cover the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form of dot,

line and plane, and form a macrosystem with banded structure and a certain geographical space. Scholars proposed that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should form an all-inclusive multi-level system composed of the ontology elements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addition, scholars also propose strategies against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unclear boundary, product homogeneity, unstable management mechanism, lagging construction of the team of management talents, insufficient guarantee for financial funds, ineffective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onstruction practice.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n China has formed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but there still remains room for in-dep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three aspects: standardiz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tegration of spatial boundary, and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erm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is supposed to, based on the reference of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national parks, formulate and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clarify the requirements for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spatial delimit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erm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atial boundary, scholars and practice departments should integrate existing boundaries and existing requirements fo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follow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four main functional areas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consider the control of land space planning, and carry ou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boundary delimitation for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and 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and integration methods. In terms of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tourist integration, clarify how to strengthen such approaches and methods a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o highlight the localization and park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connotative essenc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 spatial planning

Authors:

MAO Huasong, Ph.D.,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n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a member of the Key Laboratory of New Technology for Construction of Cities in Mountain Area, and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history and the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WU Yinghuaxia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history and the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ANG Xuechun i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history and the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XIE Shouhong i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